

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政局

从各省强大开始

1912年1月26日,在辛亥革命爆发3个月后,当时担任清廷关外练兵大臣的张作霖主动拜见了日本驻奉天(今沈阳)领事馆总领事落合谦太郎。他公开向落合谦太郎表态,与其让东三省“落在”孙中山与同盟会这些南方革命党手上,不如把东三省给日本人,“当此时此刻,日本国如对本有何指令,本人自必奋力效命”。张作霖这些表态不代表他真的想彻底“卖身”日本,但是很明显,在辛亥革命爆发后,他最先考虑的不是与中华民国共进退,而是做大自己的地方势力,甚至脱离新政府的掌控。

辛亥革命爆发后,各省纷纷宣布“独立”,这意味着在辛亥革命后很长一段时间,中国政治上的“去中心化”。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不再是封建家天下时代的上下级关系,而是平级关系,甚至中枢是否具有权威,是否有合法性,其判断标准已经不再是中枢,而转移至地方——各省是否承认中枢的最高权威性。

比如,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惨败后,张作霖也宣布东三省“独立”,这也就意味着以曹锟为首的北洋政府尽管获得了西方各国承认,但在东三省并没有合法性和权威性。

中央朝廷的崩溃

辛亥革命后,原本集权的中央朝廷崩溃,地方自治的风潮变得更盛。各省“俨然具一独立国家之形象”,有自己独立的军队,财政独立。

长期以来,中国所有王朝都以

“天朝上国”自居,自认是“九州万方之主”,但是鸦片战争打破了这一认知。如果只有一次鸦片战争也就罢了,可是接踵而来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、火烧圆明园、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、八国联军事件……这一系列打击,彻底把“天朝上国”的骄傲打落到了尘埃里。饱受西方列强羞辱的中国精英们终于醒悟了过来,要变法图强。变法,则是要变清廷之法,皇帝之法,无形之中,中央集权的权威就逐渐式微了。

1911年,粤海关在给中枢的报告里称,“本城各家报纸,向皆极力鼓吹革命”;由于绅权坐大以及地方衙门的不作为,不少并不是同盟会会员创办的报纸为了吸引眼球搏销量,竟然以“排满”为卖点吸引购买。换言之,在晚清,被皇权压制了2000多年的地方绅权随着清王朝被西方列强冲击得东倒西歪,开始慢慢觉醒,尤其是士绅们为绅权扩张想了一个美妙的借口:变法图强。这种观点认为,想要让中国强大,则必须要从各省强大开始。

不过,由于中国强大的“大一统惯性”,使得不管是军阀还是知识精英,都不敢也不能脱离“中国”这个概念去谈“地方自治”。如晚清鼓吹“广东主义”的欧渠甲(康有为门生),虽然敢喊出“广东是广东人的广东”,但也不得不强调“各省自强是中国自强的第一步”:各省先行自图自立……省省自立,然后公议建立中国全部总政府于各省政府之上,如日耳曼联邦、合众国联邦之例,即谓全中国自立可也。”

“要救亡图存必先中央集权”

因为大一统惯性的存在,晚清民初,尽管地方自治成为风潮,但没有任何一个军阀和地方士绅精英敢真正宣布“某省独立于中国”,甚至根据史料,都没有士绅和军阀真的在进行分离主义活动。

所以当清王朝不复存在后,地方自治与救亡图存的冲突就愈发明显和尖锐了起来。孙中山号召的“二次革命”,某种意义上就可以看做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主张者矛盾的总爆发,“也可以说是地方势力与袁世凯中央政府的总决战”。二次革命后,虽然地方自治势力依旧很庞大,袁世凯本人和历届北洋政府都没能解决中枢衰微的问题,但“地方自治”也彻底丧失了道义上的制高点,甚至逐渐变成了阻碍“救亡图存”的绊脚石。

这一期间,“实业救国”“教育救国”“农业救国”“商业救国”等各种思潮先后出现,一方面是精英们关于如何救国的自行探索,另一方面,未尝不是希望能借此给“地方自治”找到一个新的理论基础。

不能说这些主张“实业救国”“教育救国”等理念的精英不是爱国者,但作为活跃在地方的精英,他们也确实对中央集权有天然反感。然而,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给了“地方自治”致命一击。巴黎和会上,中国遭遇的不公正待遇证明了在20世纪20年代的国际社会,依然是一个“弱肉强食”的丛林社会;如果一个国家不能争取到“国格”,那么生活在这个国家

的所有人都是不可能争取到“人格”的。这在根子上彻底否定了“地方自治”的正义性和合法性。

巴黎和会之后,大量中国知识精英开始公开呼吁“救亡图存”,开始毫不留情地批评“地方自治”。

另外,“地方自治”始于1901年,到巴黎和会时差不多有20年时间了,此时新一批的知识分子成长起来,他们绝大多数并没有经历过“万马齐喑究可哀”的晚清,对封建王朝因为腐朽堕落导致的屈辱并无切身体会。他们更多的体会是,辛亥革命之后,国家如一盘散沙,由于中央集权的受损,即使有好的变革,也没有办法立刻推行全国。

而巴黎和会上,中国作为“一战战胜国”被愚弄,被羞辱乃至被宰割,也让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对“地方自治”没有一点好感。

因为巴黎和会上饱受屈辱,因为日本对中国实实在在的经济渗透以及武力威胁,使得所有人都不愿意再等待下一场缓慢的地方保守主义革命,而是期待着激进的速变和整全性改造中国的方案,迅速建立一个足以自保的强大国家。

日后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,之所以能够让全国各地青年来投奔,北伐军能在很短时间完成统一,除了苏联的帮助外,更重要的原因是“要救亡图存必先中央集权”这个理念,在1920年代的中国已经不需要讨论了,甚至连割据一方的阎锡山、龙云、李宗仁都不认可“地方自治高于中央集权”。中国也因此,才逐渐走出了地方割据、混乱的陷阱。 据《看天下》兰台/文

鲁迅也有“被欺”时

在我们的印象中,鲁迅先生“横眉冷对千夫指”,与人笔战能把各种人骂得灰溜溜退避三舍了事。他会被谁欺负?还真有。

任何一个人,再强,在家里总会有被“欺”的时候。许广平先生就曾这样对鲁迅说:“因为你是先生,我多少让你些,如果是年龄相仿的对手,我不会这样的。”但“偶然也会例外,那是因为我不会不加检点地不知什么时候说了话,使他听到不以为然而了”。出现这种情况,鲁迅会怎么样呢?“在白天,人事纷繁,和友朋来往,是毫不觉得,但到夜里,两人相对的时候,他就沉默,沉默到要死”,“会半夜里喝许多酒,在我看不到时候……跑到空地躺下。”“这些情形,我见过不止一次,我能这个时候把他丢下不理吗?有一次夜饭之后,睡到黑黑的凉地上,给三四岁的海婴寻到了,也一声不响地并排睡下,我不禁转悲为笑,而他这时倒爬起来。”“就这样,沉默对沉默,至多不过一天半天,慢雨散云消,阳光出来了。”由此可以看出鲁迅在家庭中性情的一面,即像普通人家的丈夫一样可气又可爱,他不吵,而是用带点自虐的方式,来天真地宣泄自己的情绪,并以此引起许广平的关注。

那么在外边有人敢欺负鲁迅吗?有,在鲁迅初到北京住在绍兴县馆那几年。面对这些欺负,鲁迅常常在日记里恶恶地比喻一下,出一口夜晚无眠所积压的闷气。

这里有一张鲁迅住在绍兴县馆的

移居时间表:1912年3月,南京革命临时政府迁都北京,教育部随之迁到西单南大街旧学部,并于5月6日开始办事。作为教育部金事的鲁迅也随之北来,5日晚到达北京,第二天迁入绍兴县馆,初住东部藤花馆西屋,11月28日下午迁至藤花馆南向小舍,1916年5月6日又移居县馆西部补树书屋,直到1919年11月21日移到八道湾。

在老家的县馆里,为什么要几次搬家呢?就是被邻居欺负的。看他老人家的日记,9月18日,“夜邻室有闻客大呼。”20日,“夜雨不止。邻室又来闻客,至夜半犹大噪(大声叫)如野犬,出而叱之,少戢(收敛)。”10月7日,“晚邻闻又噪。”老是“噪”,吵得晚上睡不着,出面告诫,虽然好点,但过后又犯,怎么办?只能“我”走,于是乎搬到南向小舍。

没想到这次新搬的地方,邻居更凶。1914年1月31日,“夜邻室王某处忽来一人,高谈大呼,至鸡鸣不止,为之展转不得眠,眠亦屡醒,因出属发音稍低,而此人遽大漫骂,且以英语杂厕。人类差等之异,盖亦甚矣。后知此人姓吴,居松树胡同,盖非越中人也。”前一个邻居出去劝,还能听一听,这一个不仅不听,反而把自己骂了一顿。总不能同他打架吧,君子动口不动手,上一个闻客能比作“野犬”,这一个比他更甚,“人类差等”,看来鲁迅在心中已经把他排除出人类的范围,算作非人类了。

据《中华读书报》李传玺/文

